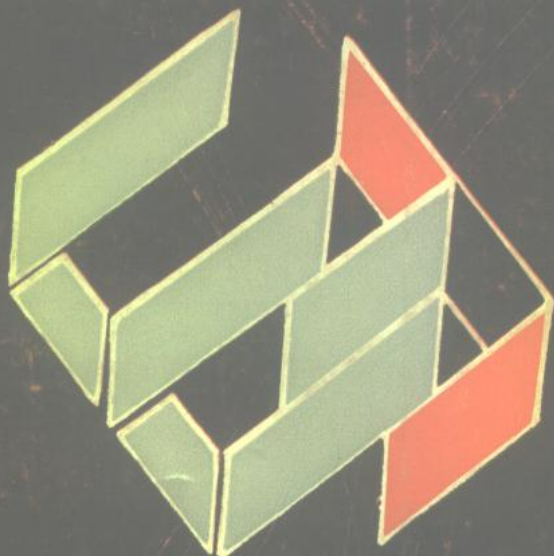




经济学家和说教者

- 著者/[美] G·J·施蒂格勒
- 译者/贝多广 刘沪生 郭治薇
- 出版者/上海三联书店

当代经济学译库



这本书中几乎所有论文都是讨论有关智识影响的问题。决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课题及其研究方法的力量究竟是什么？科学家的研究和观点又是怎样影响社会的？我所涉及的科学家当然是所有经济学家，但是上述问题却具有普遍意义。

说起经济学家——说教者，首先，也许是最重要或者最令人惊奇的事就是，他们很少说教。我想，阐明我所指的说教的含义是至关重要的。我只是指，对人们或全体社会的政策或行为方式提出清晰而又理智的劝告。经济学家——说教者关心的恰当对象是社会政策和制度，而不是个人行为。经济理论的特定逻辑需要这一指导方针，我们论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们，但是，如果我们力劝人们不要这样做，那将是自相矛盾的，也是徒劳无功的。从我们作为说教者的经历中，我得出的主要教训是，我们要鼓吹社会希望倾听的东西，在此限度内，我们会受到欢迎。或许所有说教者遵循此道会受到普遍欢迎。

一个说教者的智慧大小未必能衡量出他作为说教者的影子。

DANGDAI JINGJIXUE XILIE CONGSHU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译库



经济
学家和
说教者

by the 19th
century
of the rapid
the rise of
the discipline
academic he
merit that
appear to be
explanations.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贝多广 刘沪生 郭治薇译
〔美〕G. J. 施蒂格勒著

主 编 陈 昕
责任编辑 虞 虹
封面设计 宋珍妮

经济学家与说教者

〔美〕乔治·施蒂格勒 著

贝多广 刘沪生 郭治薇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25 插页：2 字数：257000

印数：1—3500册

ISBN 7-5426-0318-3/F·72

定价：7.60元



译者的话

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乔治·施蒂格勒所著《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一书是他的丰富多彩的论著中的较新一部。施蒂格勒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理论、产业组织和经济学说史方面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生产和分配理论》(1941年)、《经济学说史论文集》(1965年)、《价格理论》(1966年第3版)、《产业组织》(1968年)以及《公民和国家》(1975年)等。施蒂格勒教授曾经担任1964年度的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和1977年度的历史经济学会会长。他的理论建树使他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一书恰巧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那一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的。

大约有10年的时间，我们陆续接触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教材、专著和论文，但一般说来，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全部发展历史，尤其是对于西方经济学家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的伦理思想基础以及西方经济学家的写作方

法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实际上并不完全清楚。而《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一书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和阐述，使我们较多地了解到生活在西方社会里的经济学家们是如何想的，如何做的，以及他们与社会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这本著作的好处可能就在这里。

与数学和力学相比，经济学算是一门年轻的科学，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学家们的辛勤努力日益赢得广大公众的密切注意。在施蒂格勒教授生活的社会里，经济学家们不仅组成顾问委员会为国家元首出谋划策，而且还是各家大小报刊的专栏作家。每逢出现新的经济危机或新的通货膨胀，他们就评头论足，活跃异常，新闻媒介也总是在这种时候寻找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进行采访和对话。由此可见，经济学家受到了社会或者说公共事务的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们能否作出相反的表述，即经济学家也影响公共事务呢？在这本著作中，施蒂格勒教授用一种犀利的但也不乏幽默和明快的笔调，透过经济学说的发展历史，考察了经济学家在公共事务中的顾问作用，并且确信，在设计和执行政府政策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具有影响力。不过，施蒂格勒也提醒读者：尽管不能否定经济学家的这种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微弱的和难以察觉的”，并且，这种影响是产生于科学的研究而不是产生于空

洞的说教。施蒂格勒在本书中所指的“说教”的含义是：经济学家对人们或全体社会所作出的政策或行为方式提出清晰而又理智的劝告，甚至谴责。他认为，一位真正的、科学的经济学家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像传道士般的说教，而应该把对社会的影响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当然，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未必会被人们迅速地、普遍地接受；即使被人接受，也未必证明这一理论就一定正确。施蒂格勒教授考察了边际效用理论和断折的寡头需求曲线这两种理论的命运。边际效用理论虽然具有普遍意义，但却是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为专业经济学家所完全认可。而断折的寡头需求曲线早已从科学研究中消失，但至今还充斥于许多教科书之中。

说教不是经济学家的工作特征，然而，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经济学家必然是在一定的伦理思想指导下进行工作和研究，进而提出研究成果的。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说中流派林立，门户众多，那么，就其主流而言，经济学家的伦理思想基础是什么呢？是顺从于精英的知识阶层的主导思想，还是受制于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是以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为核心，还是以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为基础？施蒂格勒教授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对此作出了多层次的阐述。第一，他认为这不是一个一句话就能

解答的问题；第二，他认为经济学家受到了社会的熏陶，因而任何伦理思想都可能形成经济学家的思想来源；第三，他认为就主流而言，经济学家主要接受的是功利主义伦理体系。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数理经济学先驱埃奇沃思曾经对功利主义伦理思想作出了这样的表述：“‘机械社会’终有一天将与‘机械天堂’一起出现，分别攀上作为道德顶端的一个最大化原理的南北高峰。如同物质世界中一个微粒或张或弛的运动都不断地从属于累积能的一个最大总量一样，各个心灵的运动，无论因自私而分隔还是因同情而联系，也会不断地去实现最大的快乐能，即天地万物间神圣的爱。”施蒂格勒教授在本书中不乏溢美之词地认为，埃奇沃思等人代表了经济学中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高峰。需要指出的是，施蒂格勒教授本人则是一位自由主义色彩较浓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一书还包括了几篇用数量方法对经济学家的写作方法尤其是引证习惯进行研究的论文。西方经济学家大多具备在大学研究生院获得博士学位的背景，施蒂格勒教授在本书中考察了研究生院对经济学博士们日后写作风格的影响。由于英语国家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英语国家的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学界日益发挥支配性作用，本书对这一作用也作了分析。对于经济学家的引证习惯，施蒂格勒教

授主要讨论了经济学论著中引证谁、在何处引证以及引证频率的意义。

对经济学说史乃至思想发展史感兴趣的人，会从施蒂格勒教授的这本论著中获取信息和知识。当然，在阅读本书时，读者对作者的思想立场和观点似应有清醒的和批判的认识，以避免食洋不化的毛病。

顺便，我要感谢刘沪生和郭治薇两位同志，当我被其他工作缠住而未能赓续本书的翻译时，他们欣然应允助一臂之力，分别承担了本书第8—12章以及第16—18章的翻译任务。本书第7章和第13章原已有中译文，我们在校译本书过程中参考了这些译文，在此向原译者表示感谢。

贝多广

1989年8月于北京六里桥



原版前言

这 本书中几乎所有论文都是讨论有关智识影响的问题。决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课题及其研究方法的力量究竟是什么？科学家的研究和观点又是怎样影响社会的？我所涉及的科学家当然是所有经济学家，但是上述问题却具有普遍意义。

我无法保证读者能够找到关于这些问题的直接的、更不用说完整的答案，因为智识和政治的影响格外地微妙莫测，难以追索。一个学者只要寻求最率直地回答一下自己的观点和工作中存在着的这些重要影响，就足以证实这一关系的复杂性。然而，我还是用各种方法去“蚕食”这些问题，希望引起别人的兴趣并产生抛砖引玉的效果。

我乐于感谢与阿伦·迪雷克特、加里·贝克尔、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其他朋友的交谈对我所产生的“某种”影响。在写作第四篇“数量研究”的过程中，克莱尔·弗里德兰是一个少不得的人

物。我还要感谢有关机构允许下列论文得以重印，这些机构和论文分别是：美国经济学会，“经济学家和国家”和“经济学家和垄断问题”；杜克大学出版社，“过去的经济学有用吗？”、“斯密漫游于国家学说”、“边际效用论的采用”和“经济学中引证的习惯格局”；经济学杂志，“原文注释成为一项科研问题”；纽约科学院，“默顿论重复发现，否定与肯定”；南方经济杂志，“经济学家的作用”；多伦多大学出版社，“穆勒论经济学和社会”和“科学地应用科学人物传记，以 J.S. 穆勒为例”；西方经济学会，“经济学文献：以断折的寡头需求曲线为例”。

最后，另外三篇第一次发表的论文是1980年4月24、25和28日在哈佛大学坦纳人力价值讲座上的演讲稿，它们最初刊载于犹他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坦纳人力价值讲座》(第2卷)中。它们的重印得到了坦纳人力价值讲座这家公司的允许。

当

·

代

·

经

·

济

·

学

·

译

·

库

目 录

经济学家
和说教者

译者的话
原版前言

MULU

第1篇 经济学抑或伦理学

- | | |
|---------------------|----|
| 1 经济学家和说教者 | 3 |
| 2 竞争伦理学：友善
的经济学家 | 19 |
| 3 竞争伦理学：不友
善的批评 | 38 |
| 4 经济学家和垄断问
题 | 54 |

第2篇 科学史中的社会学

- | | |
|------------------------------------|-----|
| 5 经济学家的作用 | 81 |
| 6 原文注释成为一项
科研问题 | 97 |
| 7 边际效用论的采用 | 102 |
| 8 科学地应用科学人
物传记，以 J. S. 穆
勒为例 | 123 |
| 9 默顿论重复发现，
否定与肯定 | 142 |

第3篇 经济思想史

- | | |
|------------------|-----|
| 10 过去的经济学有用
吗 | 153 |
| 11 经济学家与国家 | 170 |
| 12 斯密漫游于国家学
说 | 195 |

- | | |
|--------------------|-----|
| 13 斯密教授的成功与
失败 | 210 |
| 14 穆勒论经济学和社
会 | 231 |
| 15 亨利·卡尔威特·
西蒙斯 | 238 |

第4篇 数量研究

- | | |
|--------------------------------|-----|
| 16 经济学中引证的习
惯格局 | 249 |
| 17 经济学博士的引证
习惯 | 278 |
| 18 经济学文献: 以断
折的寡头需求曲线
为例 | 324 |

乔治·J·施蒂格勒

- | | |
|--------|-----|
| 著作目录 | 356 |
| 英汉人名对照 | 373 |

第 1 篇

经济学抑或伦理学



经济学家和说教者

*

经济学家在论争经济理论或经济行为时，很少涉及伦理问题。他们(和我)发现，与经济分析中相对的精确性和客观性相比，这一主题错综复杂，难以捉摸。当然，伦理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人们在估价政策时必须具有宗旨，这些宗旨肯定包含了伦理内容，不过很可能是深不可测的。在这几次演讲中，我将用经济思想史作为重要的探测工具，来探

* 原载于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vol.2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我对加里·贝克尔、理查德·波斯纳和斯蒂芬·施蒂格勒的重要帮助深表谢意。在准备这些讲稿和多年的友好交往中，我与阿伦·迪雷克特讨论了这些课题，他所给予的帮助是难以计数的。我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员时完成了本文的大部分，因此我要感谢提供这一良好环境的格伦·坎贝尔。

索某些伦理方面的问题。

在这个第一讲里，我打算讨论经济学家——主要是经济学发展主流中的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如何劝导人们和社会采取合适的行为。现在我的兴趣并不在于他们已经提出的劝告，而在于这些劝告所仰赖的伦理基础。对于道德或正义，经济学家并没有特殊的专业知识，问题自然在于，对一个已经完全具备这方面知识的社会，经济学家将如何传递确切的和独特的劝告。

1. 说教知多少？

说起经济学家一说教者，首先，也许最重要或者最令人惊奇的事就是，他们很少说教。我想，阐明我所指的说教的含义是至关重要的。我只是指，对人们或全体社会的政策或行为方式提出清晰而又理智的劝告（或者更经常是，谴责）。要给说教贴上任何非中性的字眼几乎都是令人生厌的——的确，我们的语言词汇贫乏，以致无法对赞同或反对进行暗示。在最近一次论争中，一位经济学家声称他反对“通常的商业”。一秒钟后，有人问，他是否反对“商业，逗号，如通常一样”。

我将阐明我关于说教的不严密的定义，随后将引证著名经济学家们的许多观点，现在我暂时离题，向在座的非经济学家们解释一下那些著名人物的权威性。我引证的所有经济学家智商都极高，训练有素，他们有关经济学的观点值得你们注意和深思，但是到此为止。亚当·斯密是一个例外，他

处于不同的位置：如果第一次听到他的一段话，你就颇有微词，那么，你是在作无效的反应；正确的反应是问你自己：我想知道我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当亚当·斯密谈到通货的贬值时——当然，通货在当今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他那个时代——他说，“通过采用这些办法，君王和国家就能以较少量的银，表面上偿还债务，并履行各种契约。实际上，政府的债权人因此被剥夺了一部分应得的权利”。^①我想这就是在说教了，因为“剥夺”并不仅仅是一个说明性的字眼。这一温和的、我希望是合理的道德判断定义表明，我只是引证了《国富论》前 100 页中一个明显的说教例子。在后面的章节中，斯密的说教变得更加频繁，但是在李嘉图的《原理》中几乎不存在说教，穆勒的《原理》中说教也相当鲜见，而马歇尔的《原理》中根本就没有说教。当然，这些令人钦佩的人物在对许多事情表示赞同或反对时，总是斟字酌句，精妙入微。杰文斯说 1861 年莫里尔关税法案是“这个(19)世纪中最倒退的一项立法”，这句话隐含了反对的意思。^②搜集诸如此类的评论并不困难，但是这些名言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在经济学家的专著中，它们非常难得。

要是说经济学家并不醉心于频频提出挑战性的政策主张，这会使大多数非经济学家难以置信，甚至许多经济学家也不敢苟同。我相信，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是，在与一位非经济学家交谈时，经济学家除了谈论政策之外，是没有别的经济学好谈的。外行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具备足够的知识与经济学家一起讨论专业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他会发现那些著名的《新闻周刊》专栏作者的专业著述都是莫名其妙的。专业杂志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与公共政策是无关的——甚至往往